

WANG SHIJING WENJI

王士菁文集

第三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ANG SHIJING WENJI

北京鲁迅博物馆资助出版

# 王士菁月文集

第三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士菁文集·第3卷/王士菁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1119-841-6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士菁—文集 ②纪实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C53 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660 号

WANGSHIJING WENJI

王士菁文集 (第三卷)

王士菁 著

---

责任编辑: 李 冰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http://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40.25

字 数 478 千

总定价 388.00 元 (全四卷)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 目 录

## 雨霖铃

(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拟《故事新编》)

4	自序
13	引子
21	第一章
28	第二章
40	第三章
50	第四章
67	第五章
80	第六章
93	第七章
110	第八章
122	第九章
132	第十章
145	第十一章
158	第十二章
168	第十三章
181	第十四章

192	尾声
197	附录 略论杨贵妃和她有关的文学作品
<b>小天堂的毁灭</b>	
210	自序 未能忘却的纪念
<b>第一部</b>	
230	第一章 噩梦
239	第二章 梦醒之后
255	第三章 到广西去
305	第四章 金田团营
346	第五章 永安突围
<b>第二部</b>	
365	第六章 奔向“小天堂”
404	第七章 “等着瞧”
422	第八章 北伐
442	第九章 西征
479	第十章 内讧与分裂
<b>第三部</b>	
509	第十一章 毁灭
635	后记

# 雨 霖 铃

(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

——拟《故事新编》



雨霖铃夜却归秦，犹是张徽一曲新。  
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张祜：《雨霖铃》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李商隐：《马嵬》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罗隐：《帝幸蜀》

## 自序

### 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

冯雪峰同志在他的“片断回忆”——《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曾经写道：“鲁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计划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制作，是想描写唐朝文明的。这个他后来似乎不想实现的计划，大概很多人知道，因为鲁迅先生似乎对很多人说过，别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详细。我只听他在闲谈中说过好几次，有几点我还记得清楚的是，第一，他说唐朝的文化很发达，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第二，他认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了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闪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记得先生自己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但他又说他曾为了写这小说，特别到长安去跑了一趟（按即 1924 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讲），去看遗迹，可是现存的遗迹全不是古书上所见的那么一回事，——黄土，枯

蓬……他想写的兴趣反而索然了。”(见《雪峰文集》第4卷第18—19页)

这是冯雪峰同志根据他的回忆，谈到鲁迅先生准备创作以唐代文明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以及后来又放弃这个创作计划的情况。

这情况应该说是真实的。

1924年曾经陪鲁迅先生去西安讲学的孙伏园先生在他的《杨贵妃》一文中也曾谈到：“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经有人提到，手边没有书籍，不能确切征引。(按即上述雪峰同志那篇作于1937年的文章，此文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不易找到，故云。——引者注)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

孙伏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还具体地叙述了鲁迅先生此次来西安讲学和对唐代古都长安遗址的实际考察情况。他写道：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霖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爱

情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而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在这里。

恰巧西安讲学的机会来了。鲁迅先生那时已十几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到了西安以后，我们发现了一种极平凡的植物，为数实在可观，几乎家家园子里都有的，便是白色的木槿花。木槿花本是极平凡的植物，但在别处只看见一株两株，而且是红色的居多，从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样白色的一片。我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

将来《杨贵妃》的背景中，应该有一片白色木槿花。

鲁迅先生静静地望着我，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候我渐渐有了警觉，担心着《杨贵妃》的计划难免会有根本的变动了。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在我意料中也出我意料地答复我说：

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人事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象征，耳目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所以严格地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是一个腹稿。

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因到西安而被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的了。（见《鲁迅先生二三事》第23—26页）

孙伏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更具体地叙述了当时鲁迅先生准备创作这部历史剧的情况。这情况和雪峰同志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他们两人的文章里，我们得知鲁迅先生确有创作一部历史小说或剧本的计划，以及他对于唐代文明与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意见。

这情况应该说都是真实的。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从1958年起，我曾经四次去西安，但并不是为了写历史小说或剧本，而是为了给出版社组稿，落实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规划中的一些选题；每次也顺便看碑林，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大明宫遗址、骊山温泉，看昭陵、乾陵、永泰公主墓，看历史博物馆……并拜访了一些专家、学者，但也不是为了写历史小说或剧本，而是为了想增长历史知识。只有一次和写历史小说有点关系，那是受对外文委的委托，在1963年中日两国文化界、宗教界、医药界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时，陪日本文化代表团来西安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安藤更生先生是考古学家，团员宫川寅雄先生是美术史家。他们在参观大明宫遗址时，很有风趣地对我说：他们自己便是当代的“遣唐使”。他们的热情友好的言谈，引起了大家欢快的笑声。团员中的井上靖先生是作家，他曾写过以鉴真东渡为题材的《天平之甍》唐代历史小说。这部小说是由楼适夷同志译成中

文并由我们出版社出版的，因此稿酬由我交给井上靖先生，也因此得知他要写以杨贵妃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果然，他回国以后不久，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传》即出版了。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把它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小说。

解放后的西安和鲁迅先生当年所见的西安是完全不同了。不论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有巨大的发展，和唐代文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历史学家，尤其是考古学家，他们以辛勤的发掘工作为我们展示了曾经埋在黄土层下面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长安的面貌。还有我国建筑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描绘了当年古城长安的风貌。此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大量的关于唐代文明史的著作，这一切都给我们创作历史小说以启发和依据。

在我国，自唐代以来即开始出现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小说、戏剧。以诗歌形式出现的，最早有李隆基的同代人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篇，其后又有中唐诗人白居易和元稹、晚唐诗人李商隐等诗人的作品。（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诗人也写过这一题材的作品。）以小说形式出现的，则有和白居易同时的陈鸿的《长恨歌传》。和若干记载传闻轶事的笔记小说以及唐宋人所作的传奇小说。近人曾辑为《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开元昇平源》、《高力士外传》、《长恨歌传》、《杨太真外传》、《李林甫外传》、《梅妃传》。此外，《安禄山事迹》等，没有包括在内。）1985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戏剧形式出现的，有元人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清人洪昇的《长生殿》，都是比较著名的。此外还有京剧、昆曲等等；至于以其他各种艺术形式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简直多到不可胜数。

井上靖先生的《杨贵妃传》这部历史小说，和我国古代传统的艺术

形式和内容不同，有它自己的特色。作者不单纯从爱情故事着眼，而是把这一故事放到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他更不单纯地去描写所谓“性爱”的关系，——这是现代西方某些现代派作家和我国近年来新潮流作家的拿手好戏。——他不落俗套，这是值得赞许的。井上靖先生不愧是一位严肃的老作家。

在井上靖先生的《杨贵妃传》之后出版的，有一部南宫搏先生的《杨贵妃》，也是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据该书作者在序言中说，他“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在二十年间，计有五次”，用力甚勤；作者尝试“以欧洲历史小说风格而归淳于中国情调”，其努力是可贵的，也是颇有创获的。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安史之乱”本是这个封建王朝政治腐败、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权力斗争的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杨玉环不是积极参加者，而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该书作者对于杨玉环这一艺术形象的描写，似更合于历史文献；也就是说较之井上靖先生笔下所描写的政治性的人物杨玉环更合于历史的真实。然而，作者对于李、杨故事的若干具体的情意绵绵的描写，似仍未脱前人和当代人的窠臼；在作者笔下，生物性的本能跟人的“情欲”、“性爱”和“爱情”似未多加区别。至于作为该书“附录”的《杨贵妃外传》、《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女人》、《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中的某些论述和描写，其中有多处似乎是值得商榷的。——该书作者也认为某些无稽之谈是不足取的。

在这里，请允许我离开讨论这一具体的历史小说的具体题材，谈一谈人类婚姻史上的问题。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 1818—1881)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已充分证明：人类社会从群婚到一夫一妻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恩格斯对于此书也给予了

充分肯定的评价。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上个人性爱的，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因此，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

“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

“当事人双方的互相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的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些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爱慕之外，就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72—73、78页）

从这一观点来看，现在我们所说的“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爱情关系”，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地位”，并不存在一夫一妻制的古代官闱之内（唐代也不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所谓“爱情”，它只能是虚假的；所谓“性爱”，实际上也是不存在

的，它只能是男性封建统治者对于女性的强迫性的占有。虽然那表面上也许是斯文的，而在实质上则是最野蛮、最荒谬、最粗暴，也最荒淫无耻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占有。——“决不是一向征求妇女同意的”强迫性的占有。

按照唐朝宫闱制度，皇帝除了正妃，尚有二品的“九嫔”九人、三品的“婕妤”九人、四品的“美人”九人、五品的“才人”九人、六品的“宝林”二十七人、七品的“御女”二十七人、八品的“采女”二十七人、九品的“御妻”八十一人，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宫女，都可随时成为他们发泄淫欲的工具。即以唐明皇李隆基为例，见于历史文献的，据《旧唐书》(卷一百七)《玄宗诸子》记载，他即有儿子二十二人(公主未单独列出)，而《新唐书》(卷八十二)《诸帝公主》记载：“玄宗二十九女”。实际上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可能不止此数。

他在男女关系上，既没有“匹夫匹妇”的忠诚，更没有“旷夫怨女”的坚贞，这中间还有什么“性爱”或“爱情”可言呢？

因此，在若干年前，鲁迅先生计划创作这部历史小说或剧本时，据冯雪峰同志和孙伏园先生的回忆，他认为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由于深刻的分析而得来的真知灼见；他对于李唐王朝封建统治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的见解，和对于唐代因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而兴起的唐代文明的见解，也都是深刻的。

以唐代文明(或文化观念)作为背景，创作一部以李隆基和杨玉环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的历史小说或剧本，这是鲁迅先生未完成的计划。前人没有完成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后来的人应该接着去做。我国青年作家吴因易同志以他的巧妙的构思，巨大的篇幅，以开元、天宝时期的历史为背景，写下了《宫闱惊变》、《开元盛世》、《魂销骊宫》和《天宝狂飙》共一百多万字的四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1987年出版)。书中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较之井上先生和南宫先生似有更多的历史依据。作者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值得赞许的。

文学创作不同于历史文献，这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创作允许虚构，甚至需要虚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历史小说，必须有若干历史文献的依据，不必实有其事，但须在可能的情理之中，在这一方面，我国古典长篇历史小说，取材于《三国志》(包括著名的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三国志演义》，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而在另外的某些历史演义中，也有为了猎奇而编造一些出于常情之外的无稽之谈和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庸俗趣味，则是不足取的。这样的作品既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也违背了艺术的真实，只能算是封建性的糟粕了。

鲁迅先生虽然没有完成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或剧本的创作计划，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短篇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他博采文献，言必有据，不避“教授小说”之讥。虽然他自认有点“油滑”之处，但决不“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而是非常严肃认真进行创作的。这种精神就很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但是，对于我来说，由于历史知识的贫乏，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理解的肤浅，以及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和民族艺术形式的批判与继承也缺乏应有的修养，要写一部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确是一件超出了我的能力以上的工作。然而，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不妨试试看吧：力求叙事“能有旧书上的一点根据”，不太“信口开河”，尽量避免“油滑”之处，也不要“将古人写得更死”，故名之曰拟《故事新编》。

1989年12月20日于北京